

“越境”的场所

——从《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看中国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

杨晓辉

[摘要]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既表达了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生态问题的忧虑，也肯定了当时中国的一些环保举措。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剖析作者在该报告中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思考，指出有吉佐和子对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具有现实意义，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今天重读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批评；有吉佐和子；生态问题；报告文学

[中图分类号]I3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92-05

[作者简介]杨晓辉(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生态文学、日本文学研究。(辽宁大连 116034)

[基金项目]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13YJC752028)、辽宁省教育厅 2012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W2012072)和大连工业大学 2012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学课程建设与研究”(JGLX124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iterary Reflection on Chinese Ecological Problems Inspired by Ariyosi Sawako's Report of China

Authors: Yang Xiao-hui

Abstract: Ariyosi Sawako's Report of China, which was written by Ariyosi Sawako, a famous Japanese contemporary writer, is the reportage about China. This book not only expresses deep concerns about Chines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1970s, but also confirms som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of China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makes detailed analysis of Chines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Ariyosi Sawako's literary creation.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Ariyosi Sawako's literary reflection on ecological problems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her literary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vision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literature objectively,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us to reread "Ariyosi Sawako's Report of China" now.

Key words: eco-literature; eco-criticism; Ariyosi Sawako; ecological problems; reportage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1986)、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8)等作品作为中国早期生态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引起文坛关注，这类作品反映了林林总总的中国生态危机问题。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却早于中国作家，于 70 年代末就在其文学创作中阐述

了她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多年遭冷落的《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这部作品既表达了作者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生态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肯定了当时中国的一些环保举措。

有吉佐和子(Ariyosi Sawako,1931-1984)作为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导演，是战后畅销作品最多的女性作家，与曾野绫子、山崎丰子并誉

为当代日本文坛“三大才女”。有吉佐和子 1931 年生于日本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其父为横滨正金银行（现东京三菱银行）美国分行职员，1937 年 6 岁时，她随父亲去了爪哇（现印度尼西亚），10 岁回国定居东京。童年的海外旅居生活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1949 年，有吉佐和子考入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科，在校时她对日本古典和演剧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 1956 年凭借《地歌》获文学界新人奖。她的代表作品有《并非因为肤色》（1963）、《暖流》（1968）、《恍惚的人》（1972）、《复合污染》（1975）、《出云的阿国》（1967-1969），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墨》（1961）、《年轻的母亲劳动模范罗淑珍》（1961）、《孟姜女考》（1969）和《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1979）等。有吉佐和子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结，是访问中国次数较多的少数日本作家之一。纪实报告文学《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就是她第五次访华成果的结晶。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正值我国翻译界兴起“日本文学热”，大量日本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虽然于 1979 年（昭和 54 年）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但在我国仅是在 1980 年 1 月的文艺刊物《当代》书讯中被提及过，直至今日尚无中译本，相关研究亦寥若星辰。直到 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远的《中国体裁日本文学史》对该作从中国纪行文学角度作了简要评论，但篇幅不长。

今日重读《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生态问题的实际状况，以及作品透射出的超越国境的生态关怀。但与《恍惚的人》、《并非因为肤色》、《暖流》等相比，《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在我国却较受冷落，本文认为原因有三。其一，纪实文学或报告文

学是否算做文学，在我国文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圈内人士认为这类作品缺乏文学性。我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译介了大约 529 种文学作品，44 种儿童文学作品，^①这其中也包括有吉佐和子的作品，但《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却未在其列。其二，这是一部外国人视角的纪实文学，记述的内容或发表的观点是否准确尚被质疑。其三，农业公害问题在我国当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我国的环保事业已于 20 世纪的 70 年代起步，但在文革风暴的“洗礼”下，国人对农业公害问题的认识还远远不足，“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污染，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②只是近些年随着食品安全、农业公害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话题，我们才开始采取行动。

《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介绍了中国农村的农药使用情况，并记述了作者向当地农民、技术员甚至科研机构工作人员介绍化肥、农药的危害的情况。该作对“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中国农村的描述未必全面，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外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的某些侧面，尤其是能够了解有吉佐和子站在“中国”这个场所，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所以极有必要重新回顾这部佳作。

二、跨越国境的生态思索

“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有吉佐和子第五次来到中国，目睹并记录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是一部日本作家视角下的文革后的中国农村写照，是“迄今为止日本文学史上仅有的有关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③ 1966 年至 1976 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

①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44 页。

②（美）芭芭拉·沃德、（美）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 页。

③王向远：《中国体裁日本文学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71 页。

十年浩劫使中国的经济遭受了重创,一般认为,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工作出现了停滞不前或倒退现象,但我们从《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可以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西铺大队的农业试验场栽培出了建明一号、二号玉米,西铺大队实行了农业间作奖励;1964年开始,遵化新建起了碳酸氮铵化肥厂,化肥能够自给自足;农药、化肥在数量和种类上较文革之前有了很大变化,等等。有吉佐和子对文革后的中国农村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她最关注的还是农药、化肥的使用问题。她以女性的纤细敏锐,创作了长达二十五个章节的《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其中有十六章即64%的章节谈到中国农村的农业污染问题。

1975年,有吉佐和子发表了《复合污染》,将日本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小说的形式公诸于世,在日本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于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日本的近邻,是否存在同样问题,这是她发表《复合污染》之后继续关注的生态问题。从5月到6月,从北方到南方,每到一处,有吉佐和子便向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民宣传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危害。她不仅站在农业公害问题启蒙者的立场上向普通农民做宣传,甚至面向中国的农业专家做讲座、发表演说,近乎幼稚的执着中透射出的勇气和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因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有吉佐和子未必能够在作品中非常准确地描述当时中国的农业状况,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她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发现了中国人自己没有发觉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一些农民甚至农业技术员对农业公害知识知之甚少。文革时期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

管、工”,第六个字的“保”,却被理解为通过农药杀虫来保护植物。“一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做的。”“八字宪法是什么?”“就是关于农业的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第六的保,就是植物保护,用农药杀虫。”^①从动乱年代走过来的农民往往把提高农作物产量,解决温饱问题看成现代化的标志。正如有吉佐和子所言:“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的骄傲。这与二十五年前的日本完全相同。机械、化肥、农药对农村而言是现代三大神器,谁都没有考虑过这种现代化会使农村病人增加,甚至出现死亡事件。日本的农林省和农民万万没想到农业的现代化使日本粮食自给率下降。”^②七年前在日本禁止使用的 DDT 还在中国的西铺使用,这令有吉佐和子感到焦虑甚至愤怒。有吉佐和子认为,当时一些官员的急功近利思想——当务之急不是考虑百年后的危险,而是要让百姓摆脱饥饿,^③造成农业公害的扩大。而美国和日本却扮演着“死亡商人”的角色,把在本土禁用的化肥、农药运往国外销售获利,遵化县使用的化肥是贴着“财神牌”商标的日本货。

刚到建明人民公社,映入眼帘的景象也让有吉佐和子大为吃惊:“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的公路铺设完备,一眼望去便知道这是一个忙碌的收获季节。新鲜的是,马路上铺展着刚刚收割的麦子。车辆从麦秆上飞驰而过。”^④“收割的麦秆被置于烈日当空的马路上晾晒、粉碎的场景,和悠然站在马路中间、拿着传统的竹筐筛选麦子的农夫的身影,勾画出现代与古代相结合的画面。农民全然不知汽车是引发人身事故的凶器。我心惊胆战不时地想,那位大叔会不会被车撞了?”^⑤

每到一处,有吉佐和子便不厌其烦地向农民

①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1983年版第108頁。
②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123頁。
③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111頁。
④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86頁。
⑤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90頁。

宣传 DDT 等农药的危害和害虫的耐药性。她向当地人介绍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自己的《复合污染》，并把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告诉中国人，向中国农民和技术人员提出忠告：“工业从农业中争夺劳动人口，反过来又向劳动力不足的农村输送机械和化肥”，“人类支配自然的想法是狂妄自大的。我认为与自然保持友好的关系，农业才能正确、安全地发展”，“我并非完全否定杀虫剂杀菌剂的使用，作为自然现象，五年或十年会有一次病虫害异常繁殖的时期，农药应该是那个时候使用，而不是将其当做营养剂每年定期使用。”^①平实的语言背后显现着一颗忧虑的心，唤醒了—批有着生态良知的人。

王向远认为，“从《有吉佐和子中国报告》中还可以看出有吉佐和子是将环境污染问题、公害问题作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人类共通问题来看待的，这也是她要深入中国农村考察的根本动机”。^②有吉佐和子在 1975 年完成《复合污染》的创作后，越发关注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生态状况，将环境污染问题当做超越国境、全球性的问题来对待，其对中国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则具体体现在《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这部作品中。

三、关于两种生态作为的思考

有吉佐和子的创作不是只顾埋头写作、不观察社会风云、不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她总是慎重审视自己想写或所写题材是否有足够的价值和意义。有吉佐和子观察到，1979 年的中华大地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作为，其差别在于农业生产中是否使用农药和化肥。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大队 1953 年开始使用化肥，1955 年开始使用 DDT，1961 年开始使用有机

磷杀虫剂。青年农民对害虫的耐药性、喷洒农药的注意事项等农业知识一无所知，有吉佐和子似乎看到了过去的日本，日本经历的农业伤痛正在另一个国度重演。

而在另一些地方，有吉佐和子了解到很多令她吃惊和兴奋的事情。首先，她发现后牧大队 1969 年开始停用 DDT 和有机磷，比日本早两年。第二，沈阳五三人民公社 1964 年停用 DDT，1966 年停用六六六(BHC)，是世界上最早停止使用 DDT 的地区。第三，远在南方的苏州长青人民公社从未使用过 DDT，六六六也早在 1966 年停止使用。当深受现代化之苦的日本农民发现无农药的农业产出更好，从而开始选择有机农业、循环耕作的时候，长青人民公社的农民却早已从经济角度考虑，放弃了部分农药的使用。这里的农民知道农药的危害性，所以，他们一年只喷洒一次 1605 和 203 的混合液，而且由专业人员负责实施，喷洒时戴皮制长手套和口罩，穿长裤，尽量不让皮肤裸露；喷药后，竖起旗子，提醒大人孩子一周之内不要靠近；烈性药有专人管理，这是日本农林省也做不到的；这里的技术人员对作物抗药性等农业知识比较了解。第四，河北省遵化县的沙石峪大队曾经“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而今天“层层梯田绕山转，满山遍野绿油油”。“从招待所放眼望去，沙石峪山峦映绿，层层梯田绿油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诧异，在这个缺土的地方竟能有如此的绿色，但当我走到外面一看，才发觉脚下都是石头。右脚碰到石头，左脚踢到岩石碎片，所谓的路也是用岩石碎片重叠铺上的。农田的土是红色的”。^③沙石峪人愚公移山的精神令有吉佐和子大为感动。通过她的作品，日本人对中国农村有了新的认识。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农

①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 209-211 頁。

②王向远：《中国体裁日本文学史》，第 371 页。

③有吉佐和子『有吉佐和子の中国レポート』東京：新潮社。第 165 頁。

业环保事业虽有不及发达国家之处，但某些方面已有超越。

有吉佐和子第四次、第五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环保事业刚刚起步。《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虽然并未触及中国的环境政策，但在重读这部作品时，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环保举措，对反思当下的中国环境现状不无裨益。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大连海湾、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等因陆源污染导致六处滩涂养殖场关闭，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造成严重危害，等等。可以说，70年代的中国，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等问题已慢慢凸显出来。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意识到环境污染的潜在威胁，于1972年6月5日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成员的曲格平参会后大为感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在‘文革’风暴的‘洗礼’下，我们自负地嘲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害，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产生公害。”他“猛然间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1973年8月5日，中国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走上了法制轨道。“该法律明确了环境保护的范围，规定了环境保护的任务，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防治环境污染做出了若干具体规定。”^①

有吉佐和子未必详细了解中国当时的环境政策，但她通过实地考察、数据佐证的方法，及时地发现、指出了中国的农业公害问题，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文学作品不仅具有深邃的历史感，还具有前瞻性。她以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

表述，使更多的读者能参与其中并获得共鸣。可以说，这部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因为作品的题材与内容触摸到了时代的敏感神经和当时社会生活的脉搏，所以与公众的内心渴望相呼应，从而引发了无数读者的深深共鸣。

四、结语

《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展现了作者跨越国界的生态思考，生态关怀贯穿了整部作品。这部作品让读者体会到“场所意识”所强调的所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即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都同属于地球这个大的场所，地球是大的共同体，生态关怀不能仅局限于小的场所，必须放眼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的区域。地球是一个循环的圈，以农药为例，在某一个地域喷洒农药，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就可能在地球的最边缘地区发现残留物。农药化肥的残留污染了水体、天空、土壤，最后还有要由人类来承受后果，投毒者自食其毒。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直面残酷的农业污染的副作用：生育力下降、睾丸癌、乳腺癌、生殖器官病变等等。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滥用或超量使用农药化肥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虽然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但其中提出的节制使用农药和化肥、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的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环保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今日重读该作的意义亦在于此。通过日本作家的作品，我们看到另一维度的中国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作为长期关注社会问题的当代作家，有吉佐和子国际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的重要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王俊暉

^①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